



211、985 过时了吗

存废争议突然就让“211”、“985”工程成了焦点。

任何制度的建立,都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土壤,“211”、“985”同样不例外。作为我国现代化目标的重要推动力量,高校始终是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。两大工程推行十几年,我国高等教育获得长足发展。但不可否认,作为历史的产物,到了今天,这两大工程本身有了种种问题,急切需要赶上时代发展的脚步。

如今,到了停止争议,拿出改革时间表的时候了。

问题不在是否拨款,效率最大化才是关键

“从世界范围来看,建一流大学的口号并非我国独有,可以说是本世纪初的一股国际潮流。”现任教于暨南大学经济学院、对“985工程”颇有研究的年轻学者丁岚,在她已经发表的论文中这样认为。

2011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的丁岚,博士论文做的就是“‘985工程’实施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”,从经济学视角考察分析了这项耗资巨大工程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。

丁岚在论文中认为,我国高等教育的科研资源配置正在向合理方向转移,不过“仍未能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实现科研生产效率的最大化”。

论文结尾,丁岚特别感谢她在湖南大学时的指导教师赵跃宇,赵跃宇对“985工程”一些关键问题的探讨和指导对丁岚完成论文起到了帮助。赵跃宇时任湖南大学副校长,当年9月升任该校校长至今。

湖南仅有的三所“211”、“985”双料高校中,湖南大学便是一所,引发此轮“211”、“985”存废之争风暴的中南大学,则是另一所。

11月15日,存废争议正酣时,赵跃宇受访时态度鲜明,明确指出这两大工程对促进大学快速发展,“作用是巨大的。”赵跃宇称,这一结论的重要依据之一,来自几年前该校博士生所做的研究,他与这位博士生的导师经过讨论,确认了上面提到的结论。

几经查询,齐鲁晚报记者确认,赵跃宇所提到的这位博士生正是丁岚。

11月20日,齐鲁晚报记者通过邮件联系到远在美国的丁岚的导师李海峥教授,李海峥回复说,“这个问题很重要”,并将列有采访问题的邮件转发丁岚。

21日晚,丁岚在和齐鲁晚报记者的沟通中表示,她的观点都已公开发表,至今仍坚持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丁岚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切入,在比较“985”与非“985”高校的科研与教学生产效率时发现,前者无论在科研生产效率还是在教学生产效率上都优于后者。

丁岚也横向比较了与“985工程”大致同时起步,内容及运作有类似之处的韩国、日本、德国的高等教育战略,她认为上述三国进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,也遭遇了一些争议,存在的问题在我国“985工程”实施中也不新鲜。

尽管认为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,丁岚还是对当时已经实施了两期的“985工程”给予肯定,她认为,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需要国家拨款,而在于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改进,让这些拨款实现“效率的最大化”。

从其经济学的学术背景出发,丁岚认为,“对高校的科研与教学生产效率来说,资金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。”

有限资源下的最优选择

“哪有完美无缺的教育规划?”11月20日下午,谈及国外“一流大学战略”时,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于洪波告诉齐鲁晚报记者,欧美乃至日本等国制定的教育战略规划,也并非“万能”,同样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。

于洪波1996年到2000年曾在日本爱知教育大学留学,专修日本文化与教育发展史,在中外教育比较研究中颇有心得。

尽管认同中外大学战略存在问题是“普遍现象”,但对目前国内“211”、“985”工程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具有“中国特色”的难题与困境,于洪波依然直言“短时间内恐怕难以解决。”

20日下午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,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,国外“一流大学战略”也会存在问题,但与国内不同,国外高校靠的是自由竞争,而非简单“计划”出来的。

“出现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教育主管部门。”21日上午,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授给齐鲁晚报记者举例说,所谓重点项目,往往是教育部确定一个方向,而后设定一些“硬杠杠”,底下的学校就开始对照这些“杠杠”进行争抢。

“条件不符合的就改得让它符合,试验器材不达标就想办法达标。”这位教授说,为达目的,各学校、学科会大显神通——这些造假行为早就成为业界“潜规则”。

于洪波认为,行政对教育的这种干预并非凭空而来,有其历史和现实土壤。

“可以说,直到今天,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我国教育界,还存在一种‘追赶世界先进’的心理。”于洪波说,这种心理同时也是我国目前产生“文化不自信”的根源,“尤其是在150多年前,一直引以为傲的传统被打败,新的东西短时间内又建立不起来,整体焦虑感就不难理解。”

如何让有限的教育资源配置出更好的效率,成为各时期决策者们所要面对的难题。

与整个国家一起历经近代化磨难的我国高校,不但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责任,更承载着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理想。

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,我国陆续确立一批重点大学,从政策到资金方面予以全方位扶持。这项政策演变至今,就成了今天的“211”、“985”工程。

改革开放前,我国高校数量比较少,人们对于这种重点扶持政策少有异议。当时更多的口号是“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养活大学生”,星星点点的几十所重点大学更能激发起动力。

高考恢复后,我国很快重新确立了88所重点大学。但与此前相比,当时的现实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,教育经费依然处于“相当紧缺”程度,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拨款,同样相当有限。

1993年颁布的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提出,要“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”,并由此形成量化指标:“集中中央和地方等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、专业。”两年后,由当时的国家计委、教委、财政部联合印发了《“211工程”总体建设规划》,标志着“211工程”的正式确立。

尽管只是惠及少数学校的举措,但效果还是很快速显现。

按照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的说法,“211工程”实施之初,我国高等院校普遍存在教育实验器材、手段落后等问题,严重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。正是借助于这项工程的实施,清华大学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大型联网微机实验室。“211工程”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,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,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基础实验教学内容,使教育基础工程取得较大进展。

更为重要的是,一旦标杆树立起来,其他学校就有了参照系,会产生带动作用。

如果说在短缺经济条件下,为了刺激更多人投入经济建设,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,那么,“211工程”也可看做是高等教育追求“跨越式”发展,以求“先进带后进”的无奈之举。